

目 录

学科建设.....	1
“十五”规划及专家学者意见.....	1
学术交流.....	12
张涌泉教授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	12
王宁教授等来中心商讨学术会议事宜.....	12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辑来我中心座谈.....	13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一行来杭交流.....	13
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等人来我中心访问.....	13
张涌泉被聘为四川大学 211 重点项目专家组成员.....	14
方一新教授参加中国社科院举办的“海峡两岸汉语史研讨会”.....	14
工作动态.....	15
中心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15
中心主任方一新参加博士生培养座谈会.....	15
方一新教授赴贵州大学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16
方一新教授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	16
研究生动态.....	17
中心成功举办第一次研究生学术沙龙.....	17
阎艳、史光辉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7
研究生论文获奖.....	18
中心举行 2000 级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18
2001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	18
简讯.....	19
台湾记者来我中心采访.....	19
张涌泉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长文.....	19
张涌泉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奖励.....	19
本中心三位成员入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	19
文摘.....	20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	20

学科建设

“十五”规划及专家学者意见

按照教育部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制定“十五”科研规划的通知精神，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经过认真酝酿和讨论，在广泛征求国内著名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本研究中心的“十五”科研规划。

在“十五”（2001—2005年）期间，本基地共有十个重大课题需要立项研究，试简要汇报论证如下：

（一）中古汉语词典

近二十年来，中古汉语研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成果很多。当然还有许多空白。目前有近代汉语系列词典和通代词典（如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坚、江蓝生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元语言词典》等近代汉语系列断代语言词典，高文达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许少峰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有包容整个汉语史的古代汉语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等），却还没有一部系统全面地集中解释汉魏六朝文献语言的中古汉语词典。从已有的研究状况看，中古一段的文献语言特别是口语材料比较多的文献语言如汉译佛经、笔记小说、诗文、史书、碑帖、杂著以及出土文献等都有人作了专门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故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积累看，已经具备了编纂一部大型断代性语言词典的条件。因此，我们打算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囊括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又搜集了大量新词新义、具有相当前瞻性的《中古汉语词典》，以填补研究空白。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以西汉和中晚唐为上下限，重点放在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和初唐。广泛搜集这一时期的书面文献，包括佛藏、道藏、小说笔记、诗文、史乘、杂著、书信、医书、农书、注疏等中的词汇材料，同时也利用金石碑帖和新出土的敦煌遗书、

吐鲁番出土文书等，全面系统地诠释汉魏六朝语词，着重解释其中的口语词。力图在较为深层而又广泛的研究基础上阐述中古时期汉语语言特色、演变轨迹以及对近现代汉语的影响，从而形成一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集大成的《中古汉语词典》。

本课题研究的意义：编著《中古汉语词典》，将会弥补汉语史研究领域内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为构建完整的汉语史作贡献；本课题的研究成果还将为大型辞书编纂提供参考，纠正存在的缺失；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同样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词典》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提高古籍整理工作的质量，为更好地普及、推广传统文化服务。

编纂工作将充分利用现有的图书资料，包括电子版的索引、地下出土文献材料等，利用计算机检索系统，尽可能使研究手段现代化。

（二）敦煌经部文献整理研究集成

本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唐五代前后的写本及少量刻本文献，震动了整个国际学术界，并由此诞生了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敦煌学，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术和文化研究的面貌。这些写本(或刻本)文献中包括许多古代四部(经、史、子、集)书的内容。近一个世纪以来，研究敦煌学的外国学人们对上述四部书中的史、子、集三部分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比较而言，上述四部书中经部文献的研究则显得相当冷寂，成果也少得可怜，见闻所及，只有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成》、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和台湾学者关于群经的几本校勘著作，以及少数几篇论文(有的校录成果疏误极多)，既无系统性，又缺乏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敦煌卷子中经部文献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既有传统的群经写本，包括《易》、《书》、《诗》、《礼记》、《春秋》(包括《左传》和《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传世经典，也有许多失传已久的珍贵典籍，如晋徐邈《毛诗音》、《礼记音》、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此书日本有古写本传世)、隋陆法言《切韵》系韵书、唐郎知本《正名要录》、郑氏《字宝》、佚名《时要用字》、《俗务要名林》，

等等，写本总数达四百件左右。这些写本的发现不但使许多珍贵逸典得以重见天日，而且可据以校正传世经典中的大量传刻之误，历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也可由此找到答案。如宋郭忠恕的《古文四声韵》载录了许多“古文”。对这些“古文”的可信度，后人大多将信将疑。后来人们发现该书所载的“古文”往往可以在敦煌写本《古文尚书》甚至更早的秦汉简牍帛书中找到答案，这才知道郭书是有所本的。又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杂艺篇说北朝俗字“言反为变，不用为罢”，人们千百年来苦思不得其解。后来我们看到敦煌写本《正名要录》，才使这一千古疑案大白于天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但由于敦煌写本大多扃于密室，而其影印本又往往价格昂贵；加上研读敦煌写本有许多不易克服的障碍(如俗字连篇，辨认困难)，经部仅有的少量研究成果又往往分散各处，查检不便，以致这些珍贵文献长期以来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令人遗憾。有鉴于此，我们拟发挥浙江大学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校理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前人校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经部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校录整理，为读者提供一部高质量的集大成的敦煌经部文献的定本；同时根据每位研究人员的特长，开展一些专题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把敦煌经部文献的精华介绍给广大读者。

本课题分整理和研究两部分。整理部分将在前人校录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敦煌经部文献进行系统全面的分类校录整理，最后推出《敦煌经部文献集成》一书。研究部分将在分类整理的基础上，对敦煌经部文献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初步考虑开展以下专题研究：《敦煌群经通论》、《〈切韵〉复原研究》、《敦煌字书研究》，以及综合性的《敦煌文献校读释例》等。所有成果将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三)《唐五代韵书汇纂》(以下简称《汇纂》)

该项目是依照韵书语音系统将唐五代各种韵书对比排列、做出校勘的整理性研究工作。此课题意义：

韵书是音韵学研究的史料，也是研究古代词汇、文字的重要材料。唐五代韵书是

韵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后来的韵书在体例和内容等方面都承之而来，把唐五代韵书排比对照成书，不仅可以看出韵书体制的演变、韵书源流的脉络、韵书系统的划分，而且可以为语音、词汇、文字的研究者提供集中的材料。这样的韵书汇纂“不是给从前研究切韵的人作结束，而是给以后研究切韵的人作引端。”（罗常培《十韵汇编序》）《十韵汇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整理成果，许多新的材料没有能够收录，而且由于技术条件限制，没有能够采用利用原书剪贴以避免错误的既定方案；《唐五代韵书集存》采用照相影印汇集了各种材料，但没有《十韵汇编》对照排列各种韵书的优势。利用现代的技术，从英藏、法藏、俄藏等敦煌数据中和其它渠道获得更清晰的底本，用更便于使用的方式汇编更丰富的材料，就成为一项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此课题内容及方法：

《汇纂》计划收录范围包括全部现存唐五代韵书（包括残卷残叶），并收录宋代的《广韵》、《集韵》。《广韵》是人们熟悉的《切韵》系韵书，《集韵》作音归韵、收字释义或录古音、或改今言，材料丰富，通常也作为《切韵》系韵书使用，因此作为参照与唐五代韵书比照。

体例的具体细则正在拟定，初步计划基本采用《十韵汇编》的对照排比各种韵书的体例，但一韵之下，将整韵对比排列方式改为按小韵排列方式安排诸韵书，并用传统字母标注声类，用一二 ABCD 四及开合字样标注韵类，以充分体现现代的研究成果。编制各种表格及字、韵总目，对照比较各韵书的韵部、小韵、反切等的异同和次第，并做出各种统计数字，以提高的《汇纂》使用价值。由于将材料汇集在一起，通过对比，讹误自然显现。但对于原书错误，仍然出校或附入诸家重要校勘，以供读者参考。

操作上利用现代技术通过扫描或激光照相，将图片去黑处理后在计算机上“剪贴”好再排版，不采用传统的剪贴或抄写的方式，这样可避免新出错误。整理步骤，大致先对各种韵书材料进行计算器预处理，把各种韵书材料全部扫描后用图片格式编号保存备份，然后将需要去黑的部分做去黑处理（利用质量高的图片可以节省这道工

序），在体例细则确定以后，在计算机上将上述图片进行剪贴排版，并出打印稿。以后出版社可以用激光排版。

该项目面临许多音韵、文字、词汇以及校勘方面的难题，也需要解决现代技术处理韵书这一特殊类型的古代文献的许多技术问题，希望有关方面的专家同行给予指导和支持。

（四）上古汉语词汇研究

上古汉语是中古、近代汉语的源头，因此，上古汉语研究的深入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古、近代汉语研究的深度、广度和质量。上古汉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还有待于提高。应该大力加强上古汉语词汇和词汇史的研究。具体的做法是，对上古汉语分阶段研究，拟大致分为春秋、战国和秦汉三期。春秋时期以《左传》、《国语》、《诗经》（国风）、《论语》、《老子》为代表；战国时期以《战国策》、《荀子》、《庄子》、《韩非子》为代表；秦汉时期主要指秦和西汉，包括李斯、贾谊等人的文章、《吕氏春秋》、《淮南子》、《盐铁论》、《史记》等作品以及《尔雅》、《方言》等研究著作，分门别类作系统的研究。先秦词汇研究的内容包括：春秋、战国时期词汇概貌；春秋、战国时期的单音词和复音词；春秋战国时期的同义词和反义词；春秋战国时期的基本词汇研究；春秋战国词汇的新词新义；春秋和战国词汇异同研究；春秋、战国词汇对后代的影响等。秦、西汉词汇研究包括论述词汇概貌，分析复音词的类型、形成原因，探讨新词新义的产生途径，常用词的演变等。

在研究过程中，拟采用归纳与比较、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点带面，在专书研究、专题研究及分段研究的基础上，对上古汉语词汇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既有专题性的成果如《上古汉语同义词研究》，也有通史性的《上古汉语词汇史》（先秦词汇史、秦汉词汇史），为汉语史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五）佛经词汇研究

这里所说的佛经包括传世的《大藏经》和敦煌佛经。出于传教的需要，相对于中

土文献而言，佛经词汇往往比较口语化，这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翻译佛经中尤为突出。进入到80年代中期以来，汉语史学界开始重视佛经词汇，陆续出现了大量徵引佛经语料的论著和专门以佛经语言词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但翻译佛经数量大，有价值的材料多，迄今为止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本课题拟对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佛经词汇作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190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大部分是佛经的写本，这些写本佛经和传世佛经相比，在文字上颇有歧异，而像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我国《中华大藏经》等佛经版本都还没有利用敦煌本来作校勘，其中不少异文反映了口语词和书面语的差别，体现了通语和方言的差异，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值得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故敦煌佛经也是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本课题拟分阶段、分专题来进行研究。从宋以前译经的阶段来看，大体可以分成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四期。从研究专题来看，主要是对语言词汇作全面研究，重点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佛经词汇的特点及研究意义；二、唐以前翻译佛经的新词新义；三、唐以前翻译佛经的常用词演变研究；四、唐宋佛经词汇的研究价值；五、唐以前佛经的复音词研究；六、传世佛经与敦煌佛经的比较研究；七、敦煌佛经异文例释；八、佛经口语词考释研究。也将对佛经作鉴别和辨伪研究，通过提取语言特征、考察常用词演变、考证一般语词的产生年代、考察虚词的使用情况、判断式、被动式、动补式、处置式等句式的结构特点等来考证佛经的翻译年代及译者，为汉语史研究者提供可靠的佛经语料。

（六）中古音韵、方言和语法研究

(1)中古音韵、方言部分。研究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古语音、方言的断代特征及其地域变体，结合上古语音、方言和近代语音、方言的研究重点，考察中古音韵、方言在语音系统、古方言系统结构方面的特征，阐述这些特征的形成、演变和发展，注意这些特征在不同地域中的不同表现。第二，广泛收集具有断代意义和地域意义的代表性材料，对六朝和唐五代时期的文献尤其是

汉译佛典及敦煌文献中的语音、方言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构拟，总结演变规律。第三，各种中古语音、方言材料在中古语音、方言研究中的协调处理及相关问题，注意深入研究诸如字书、韵书和音义材料的反切以及诗歌押韵所反映的声类、韵类、调类，不同音译材料和方言以及域外方言的音值、韵图所反映的音位等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中古音韵、方言研究中的地位。第四，中古语音、方言系统及其在中古词汇、中古语法研究方面的运用问题。

(2)中古语法部分。中古语法是以往语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往仅有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等著作和为数不多的单篇论文而已。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研究队伍和成果有增多的趋势。和先秦及唐宋时代的语法截然不同，中古时期的语法自有其自身的特点，词法方面诸如产生了一批新的代词；类似于词缀的构词成份如“～自”“～复”等开始广泛运用；副词特别是复音式副词大量产生；量词运用广泛；介词和连词也有新的发展；句法方面，使用系词“是”的判断句运用日趋普遍；被动式、处置式、动补式等也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为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的普遍使用和定型奠定基础。研究语料也从传统的中土文献逐渐向佛经文献拓展，丰富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领域。

研究工作将从描写语言事实入手，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国内外语法学界的理论和方法，并把它科学地运用到古汉语语法研究中去。对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语法问题，如复音化进程、同义词演变、词汇语法化问题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力图揭示规律，并进而提炼古代汉语语法的理论观点，为断代和通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 敦煌文献语料库

敦煌文献的内容涉及我国十一世纪以前(尤其是五世纪至十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分散在中、英、法、俄、德、日、美等多个国家，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最近几十年来，在各国国学人的呼吁和努力下，才陆续公布于世。如《敦煌宝藏》、《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等，从而为各国学人查阅敦煌文献更清晰的影本提供了条件。但由于这些书价格昂贵，若以学者个人的财力来购置显然力不从心，即使是一般的中小型图书馆也很难有财力全部予以购置。同时由于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馆藏流水号影印出版的，没有分类，编排杂乱，读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鉴于以上原因，我们拟发挥浙江大学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传统优势及在多媒体与智能集成技术方面的雄厚实力，在1997年即已着手编纂的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和潘云鹤院士为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利用多媒体与智能集成技术进行敦煌文献艺术的保护和复原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建设敦煌文献数据库。估计整个数据库字数将达八千万左右。录入数据库的敦煌文献将按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整理编排。经精心整理校勘的录文输入电脑后，将编制编号、书名、卷名、字词等多种检索程序，再配以原件的图版，以增加可信度，图(敦煌写卷)文(经过标点整理的录文)对照，为学术界提供一套校录精确、查阅方便的敦煌文献的查阅检索系统。整个数据库既将制成光盘出版发行，还将建立敦煌文献多媒体可视化网站，供全世界研究人员和感兴趣的公众查询和使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各国学人(包括利用敦煌资料的学者)，将能化费不多的钱而拥有一整套敦煌文献，并且图文对照，检索便捷，从而使珍贵的敦煌卷子从图书馆走进学者的书房，使敦煌文献成为世界学人在书房中即可利用的材料。这对于促进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对于促进中古近代汉语的研究，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八)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何乐士近些年来对《左传》的语法研究、郭锡良在先秦汉语构词法以及介词、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方面的研究等都具有示范作用，引人注目。但是作为整个上古语法历史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近些年来，语法研究有了一些新的突破，新的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已经具备了撰写语法史的

条件。研究步骤与上古汉语词汇史大体相当，即按历史阶段分期研究。具体内容包括：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名词系统、动词系统、形容词系统、副词系统、代词系统、数词系统、介词系统、连词系统、语气词系统等；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判断句、叙述句、否定句、疑问句、被动句等。可以分专书、专类逐项研究，利用计算机检索作出定量分析和穷尽性考察，运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词性和句法的变化，找出内在联系，探索变化的原因和规律，最终完成一部代表当代高水平的《上古汉语语法史》。本课题主要采用招标的形式，面向海内外，吸收高水平的研究人才主持此项课题。

（九）古汉语构词法研究

语言研究到了一定阶段，在单个的、专书的、专类的语词研究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描写一个时期的词汇构成系统已经成为可能。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从构词法角度探讨中古时期复音词构成方式，这样的工作以前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的词汇也不例外。但是，同音韵学、语法学、文字学、方言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比起来，古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汉语史稿》下册第四章《词汇的发展》第54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词与词之间是怎样密切联系着的？复音词有那些类型？有些什么组合规律？这是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其中附加式构词法是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附加式双音词是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汉语复音词中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研究方法是从单个词语到一类词语，在比较和分析中阐述词语中各语素的排列规律，组合方式。要发现词与词之间的这种联系，不能对词语只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而要把同类型词语集中起来进行考察，概括出同类词语的本质特色。许多词语考释类文章或著作都注意了这一点，近年来讨论的“复”字、“自”字作词缀的构词特征，就是注意语词系统性的一个结果。在词义研究的模式上，

要对一组词、一类词或相似类型的词语作整体考察。如不但注意“春来”是春天的意思，还要注意“秋来”、“冬来”、“年来”、“今来”、“晨来”、“晓来”、“晚来”、“顷来”等一系列表示时间的名词。按照复音词词性、类别等逐类探讨其构成方式。

（十）汉语语源研究

现代汉语源于古代汉语，尤其中古汉语、近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直接源头，许多六朝、唐宋时期产生的语词在现代汉语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而《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在一些现代汉语语词溯源上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一是以为现代汉语中才出现的词语实际上早在中古或近代时已经出现了；二是许多口语词汇的来源还没有找到，一些词语得名的缘由还不清楚；三是一些词语的源头还可以往前追溯，时代可以提前。做好这些工作，对于现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都有直接的好处，对于这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具体做法是：以《汉语大词典》为主要参照系，结合《现代汉语词典》，把那些可以找到直接出处、原始出处的词条逐个分析论证，对一些语源分析不当、含义理解有误的词条作出正确的解释，最终写成《汉语语源研究》或《汉语语源词典》。

以上各个项目将视情况分设成若干个子课题，具体的课题名称或顺序还可能随着研究的进展及人员的变动作相应的调整。所有这些课题都将面向海内外招标，以集中学术界这一领域的最优秀人才，为顺利完成这十个重大课题的研究提供保证。

我们在制定这份“十五”科研规划过程中征求了国内同行专家北京大学蒋绍愚、朱庆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教授，南京大学鲁国尧、汪维辉教授，四川大学项楚、张永言、赵振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董志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刘利教授等先生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赵振铎教授指出，近年的语言研究越来越向各个相邻的领域渗透，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部门，汉语史的情况也不例外，应该注意在这方面加强与相关学科的配合，拓宽研究的范围，使研究工作能够不断从这些学科吸收新的营养，充实自己，为我所用。

江蓝生教授指出汉语史研究“十五”期间的发展趋势是：(1)今后的研究内容将由零散随意而趋于更有目的、更有计划；研究方法也将更加趋于科学、系统、严密。(2)会进一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扩展、深化、综合，使之在原有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个台阶。(3)将会有人继续研究金元、明时期汉语北方话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进而探讨近代汉语共同语的形成。(4)从带有训诂学特征的疑难词考释，转向以考察常用词的演变过程为主的词汇史研究上来。(5)理论意识将得到加强，研究者将更自觉地对语言发展规律和语言发展机制加以探讨，自觉引进现代语言学有关语法化和语言类型学的观点作指导。

汪维辉教授认为“九五”期间学科发展中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急功近利。“十五”期间汉语史学科在各方努力下，必将得到健康的发展，大致有这样几个发展趋势：一是随着大规模电脑语料库的建成，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将更加全面准确，研究工作的重点将从语言事实的发掘逐步转向语言演变规律的揭示和演变原因的解释。二是汉语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将日趋浓厚。三是汉语史的研究将跟现代汉语研究和汉语方言史研究紧密结合。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将为汉语史的研究开辟出崭新的天地，极大地推动各个分支学科朝纵深方向发展。

董志翘教授指出“十五”期间的汉语史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必要化一定的时间精力认真回顾总结二十世纪汉语史研究的成果、经验及不足。二是汉语史研究的深入，资料建设应放在首位。三是在汉语史研究过程中，要与汉语方言研究相结合。在古今打通的同时还要注意中外打通。

刘利教授就古汉语语法方面提了几点建议：一是要把描写古汉语语法事实放在首要位置，二是古汉语语法研究亟需进行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三是应进一步开展汉语语法要素演变的研究。

蒋绍愚教授就“九五”研究概况及“十五”发展趋势分别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学术交流

张涌泉教授赴台参加学术讨论会

2001年4月17日至22日,应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荣芳博士的邀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张涌泉教授赴台湾参加“第三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讨论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题为“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的学术论文。

“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讨论会”是由国家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和召开的学术会议,此前已举办两次,这次是第三次,共有来自两岸的六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陆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及教育部的二十五位代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海外汉学研究、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等。

王宁教授等来中心商讨学术会议事宜

2001年4月28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王宁教授、李国英教授、李运富教授来中心商讨举办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事宜。

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和浙江章太炎纪念馆合办的纪念章太炎黄侃学术研讨会将于今年九月在浙江杭州和海宁召开。中心主任方一新、副主任张涌泉、王云路邀请章太炎纪念馆有关负责人一道,就举办会议的各项具体事宜与王宁教授等作了深入细致的交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辑来我中心座谈

2001年5月30日，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李梦生社长等一行来汉语史中心与中心成员座谈，主要议题是：当前词典出版的有关问题。

李社长首先介绍了《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过程，并就准备对《汉语大词典》作续编、补编等情况作了说明，中心成员就词典编纂中的词条举证、义项确立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向客人介绍了汉语史研究中心的建设情况，重点介绍了中心几个重大课题的内容及相关成果：《敦煌文献语词大典》、《中古汉语词典》、及《上古汉语同义词词典》。

座谈会上，双方还就词典编纂选题、发行等其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一行来杭交流

2001年5月23日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拉波夫教授、著名历史语言学家、宾大克拉克教授、堪萨斯大学冯胜利博士等来杭。本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王云路教授以及本中心成员黄笑山教授、俞忠鑫教授、池昌海副教授就学科建设、研究生培养等问题与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等人来我中心访问

六月初，中华书局总经理宋一夫博士等一行五人来我中心及古籍研究所访问。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安排了接待和座谈，并就本中心的重大项目《敦煌文献合集》等书的编辑出版问题和中华书局负责人协商，并达成了一致意见。

张涌泉被聘为四川大学 211 重点项目专家组成员

应四川大学校长卢铁城教授的邀请，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作为专家组成员 6 月 14 日至 16 日赴四川大学，对该校的 211 工程重点项目“汉语史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进行验收评审，并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

方一新教授参加中国社科院举办的 “海峡两岸汉语史研讨会”

应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研究员的邀请，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 6 月 3 日至 5 日赴北京出席了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海峡两岸汉语史研讨会”，并作了题为“唐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大会发言。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两岸三地的汉语史研究人员，其中港台学者有台湾“中研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台湾音韵学会、训诂学会会长、台湾师范大学陈新雄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郑再发教授，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主任竺家宁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邹嘉彦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副教授刘承惠等；大陆学者有北京大学裘锡圭、郭锡良、何九盈、蒋绍愚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江蓝生、侯精一、董琨、张振兴、曹广顺、姚振武研究员，以及赵诚、李如龙、唐钰明、袁宾、马重奇等先生。我中心兼职教授、北京大学朱庆之教授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工作动态

中心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2001年5月25日下午中心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在会上，中心成员就教育部重大项目的申报、经费的使用、分配等问题达成了共识。中心主任方一新、副主任张涌泉、王云路进一步明确了职责：方一新负责科研规划和中心日常工作、张涌泉负责图书资料的管理和部分学术会议工作、王云路负责学术刊物编辑和学术会议。另外，方一新向中心成员通报了在天津举办的博士生培养座谈会情况，王云路向中心成员通报了即将在九月份召开的第二届中古汉语研讨会筹备情况。

中心主任方一新参加博士生培养座谈会

为了促进中国语言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工作，2001年5月18日，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等二十八个中国语言学博士点的四十多位语言学博导汇聚天津，在南开大学举行了座谈会。会议期间，专家们着重就语言学博士点之间的优势互补、博士生质量的核定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了许多共识：一、各博士点各有所长，应该优势互补。二、因核心刊物有限，建议不要硬性规定博士生发表论文数量，可以采用国外常用办法，由几位同行专家来认定论文是否达到核心期刊的要求。三、课程要求规范，但各校不宜完全一样。四、不要追求毕业率，论文答辩时间应放宽，应允许三年期满但未完成合格论文的同学先工作。

参加会议归来的方一新主任说，这是一次很不平常的会议，这么多博士生导师济济一堂，一起探讨中国语言学人才培养战略问题，必将对语言学人才培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学科的人才培养也具有示范作用。

方一新教授赴贵州大学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

应贵州大学中文系王镆教授之邀，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6月8日至11日赴贵州大学主持五位硕士生论文答辩，并与贵州大学中文系的语言学同行进行了座谈。浙江大学和贵州大学是友好学校，双方在汉语史研究领域有着长期而友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方一新教授的此次贵州之行，有利于加深相互间的了解，更好地进行合作。

方一新教授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

6月6日至8日，在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郑造桓同志的带领下，我校社科部罗卫东部长、农村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黄祖辉教授、汉语史研究中心方一新教授出席了教育部召开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部属人文社科103家重点研究基地的校长（书记）、社科处处长和中心负责人。会议有以下四方面的议题：一是交流基地建设的经验（我校“卡特”主任黄祖辉教授介绍了基地建设的经验，受到好评）。二是讨论修改《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形成文件。三是商讨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学科组联席会议事宜。四是参观考察在京高校的若干个重点研究基地。郑书记、罗部长和黄、方两位主任分别听取了北京大学中国文献研究中心的经验介绍，参观了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办公和资料用房。

研究生动态

中心成功举办第一次研究生学术沙龙

2001 年 4 月 6 日,中心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近二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会聚一堂,举办第一届研究生学术沙龙。由 98 级博士生阎艳主讲唐诗中有关饮食文化的词语研究。大家对饮食文化语词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纷纷询问发难,互相交流,整个讨论会气氛非常热烈。

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对学术沙龙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这种形式十分有利于研究生的互相交流,扩大学术视野,并指出中心将在各方面为学术沙龙的举办创造条件。

据悉,这种学术沙龙将长期举行下去。

阎艳、史光辉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2001 年 5 月 25 日,中心 98 级博士生阎艳、史光辉论文答辩会在中心会议室举行。阎艳博士的论文题是《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答辩委员会认为,该文选题角度新颖,论证精密,有个人独到的见解和发明,各位委员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一致同意授予阎艳同学博士学位。史光辉博士的论文《东汉佛经词汇研究》经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认真评审,认为这是一篇选题精当、考证详密的博士论文,有些章节颇见功力,并全票通过史光辉的论文答辩,建议授予博士学位。

阎艳博士的导师为黄金贵教授,史光辉博士的导师为方一新教授。答辩委员会由复旦大学古籍所吴金华教授任主席,成员有杭师院樊维纲教授、汪少华教授以及本中心祝鸿熹、黄金贵、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五位教授。

参加旁听答辩的还有本中心近二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及外校人员。

研究生论文获奖

汉语史研究中心 99 级硕士朱大星的论文《试论敦煌本〈文子〉诸写本之写作时代及其价值》(《文献》2001 年第 2 期)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二等奖;99 级博士何华珍《中日语言对比的汉语史研究》等系列论文(《浙江学刊》2000 年 6 月等)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奖二等奖;99 级硕士叶贵良《常用词研究》系列论文(《古汉语研究》2001 年 4 月等)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奖三等奖;99 级硕士徐清《六朝书论词语札记》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学生优秀成果奖三等奖(《书法》2001 年 4 月)。

中心举行 2000 级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6 月 26 日,汉语史研究中心 5 位博士、10 位硕士作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史中心成员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研究生们介绍了毕业论文的选题和主要构想,中心老师和同学纷纷提问,阐述自己的意见,气氛热烈。

开题报告会不仅增加了教师和学生交流的机会,而且也为开拓研究生的学术视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2001 年硕士研究生录取工作结束

经过中心成员紧张认真的面试,本中心 2001 年 9 月份入学的硕士研究生名单最后确定。我中心汉语史专业共招收 9 人、古典文献专业共招生 6 人。

简讯

台湾记者来我中心采访

2001 年 4 月 13 日参加“华东名校世纪行”的央视、华视、东森、TVBS、中广、中视卫星等 13 位台湾记者来校采访，记者们兵分两路，其中一记者特地来我中心进行了参观考察，中心有关领导出面接待，并介绍了中心的历史和现状。

张涌泉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长文

《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发表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题为《从语言文字角度看敦煌文献的价值——为纪念敦煌藏经洞文献发现一百周年而作》的长文。文章分敦煌文献的文字学价值、敦煌文献的音韵学价值、敦煌文献的词汇训诂学价值、敦煌文献的校勘价值四个部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敦煌文献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巨大价值。

张涌泉获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奖励

2001 年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基金基金日前揭晓，我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的《论〈四声篇海〉》获教师论文三等奖。

本中心三位成员入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

今年 5 月份，中国训诂学研究会进行了第六届理事会选举，我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均以较高票数当选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文摘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

浙江大学 张涌泉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也为长期以来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敦煌遗书中的《切韵》系韵书、《字宝》、《俗务要名林》、《正名要录》、《时要字样》等，都是失传已久的唐五代撰作的“小学”书，围绕这方面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同时敦煌文献中所包含的大量唐代的口语和俗字资料、汉藏对音资料、吐火罗文等少数民族语文资料，孕育或推动了近代汉语、近代汉字、吐火罗语研究等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和发展。下面我们试以音韵、词汇编训诂、文字、语法四方面为线索，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情况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音韵 敦煌遗书在音韵学方面的价值，是最早为海内外学人所注目的，也是成果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早在1921年，王国维据照片把英藏的三种敦煌《切韵》残卷抄录印行；稍后又撰写了《唐写本〈唐韵〉校记二卷佚文一卷》、《书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切韵〉后》等文，首开敦煌韵书校录研究的先例。1925年，刘复《敦煌掇琐》辑录法藏伯2011号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及两种《切韵》的序文。嗣后，丁山、董作宾、方国瑜、罗常培、厉鼎焯、蒋经邦、陆志韦、魏建功、姜亮夫等续加搜考，又有许多新的收获。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刘复、魏建功、罗常培编的《十韵汇编》，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几种敦煌韵书都收集在内。1955年，姜亮夫把自己以前在国外摹录的一些韵书集为一编，名为《瀛涯敦煌韵辑》，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印行。

姜书凡三大册二十四卷，分字部、论部和谱部三部分。字部收敦煌韵书摹本凡三十三种；论部收论文二十一篇，对所收韵书卷子的抄写年月、版式、体制及其流变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和考证；谱部据敦煌韵书卷子及其它材料，制成《隋唐宋韵书韵部总谱》、《诸隋唐宋人韵书反切异文谱》等表。同年，姜氏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发表题为《切韵研究》的长文，全面地反映了《瀛涯敦煌韵辑》论部诸文的主要观点。后来姜氏又把《瀛涯敦煌韵辑》字部、论部修订改编为《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交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姜氏的贡献主要在于在当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把许多流散在外的敦煌韵书卷子摹录辑集为一编，并大致恢复了在我国失传已久的隋陆法言《切韵》的原貌。但限于当年的条件，姜书的录文间有若干疏误。有鉴于此，后来潘重规据敦煌写本原卷（或缩微胶卷）重加校核，并补充了姜书的一些遗漏，出版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74）。1983 年，中华书局又推出周祖谟的《唐五代韵书集存》上下册，则是这方面搜采最为全备、考订最为精审的集大成之作。周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那些大多残缺不全、没有书名、没有著者姓名的韵书材料划归为七类：（1）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2）笺注本《切韵》；（3）增训加字本《切韵》；（4）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5）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6）《唐韵》残本；（7）五代本韵书。每一类下，编者都附以韵书写本或刻本的照片，一些照片不够清楚的，还另附摹本或摹刻本。编者对书中所收的每一种韵书，都作有一篇考释，说明原书的体制、内容及其特点，并与相关韵书比较，指出异同，阐明彼此之间的关系。1994 年，周书由台湾学生书局重版，增加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笺注本切韵》、《唐韵》残叶三件，益见完备。

除了韵书以外，敦煌遗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音义类写本残卷，尤其是一些经籍旧音，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三十年代中，王重民到巴黎、伦敦调查敦煌写卷，对伯 3383、斯 2729 号《毛诗音》，斯 2053 号《礼记音》，伯 2494 号《楚辞音》，伯

2833号《文选音》都曾撰文加以介绍。其后闻一多、王大隆、刘诗孙、罗常培、周祖谟等续有考论（后来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已把有关成果荟萃其中）。而对于数量更多的佛经音义类写卷，虽早在1936年许国霖就在《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中逐录过若干这类卷子，后来周祖谟撰《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也引用过敦煌写本残卷，但近些年才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1991年，许端容撰《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敦煌写卷考》一文（《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指出前此泛称佛经音义或归属于侯考诸经的斯5508、伯2948、3971、北8722号写卷皆为可洪音义之抄本。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推出张金泉、许建平合著的《敦煌音义汇考》，堪称敦煌遗书音义类写卷的集大成之作。《汇考》分四部书音义、字书音义、佛道经音义三类，凡得音义写卷约643号，主要归并为23种书目之下，每种写卷下都包括题解、照片、校记三部分。题解包括名称、年代、作者的考定及价值、前人研究情况的评述；校记除比勘异文外，重在明俗字和辨字音。该书以其“搜集的齐备、题解的精彩、校记的渊博”（鲁国尧书评语）而得到学界的好评。但该书图版多有湮漫不清之处，写卷录文亦间或有误，影响了其实际使用效果。

敦煌韵书、音义写卷的发现，以及其它敦煌遗书中蕴含的丰富的音韵资料，也给唐代前后语音（尤其是西北方音）的研究以很大的推动。1933年，罗常培刊布《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该书根据《千字文》、《金刚经》、《阿弥陀经》、《开蒙要训》等敦煌汉藏对音写本及《唐蕃会盟碑》中的汉藏对音资料，勾勒出了八世纪到十世纪西北方音的概貌，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语文》1963.3）、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3）、张金泉《敦煌俗文学中所见的唐五代西北音韵类（导言）》（《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1985）、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及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

史の研究》(创文社, 1988)等文也是利用敦煌遗书中的音韵资料考察唐五代语音的重要成果。此外, 罗宗涛《敦煌变文用韵考》(台湾众人出版社 1969)、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3~5)、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 1983)、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杭州大学学报》1981.3)、《敦煌变文假借字谱》(《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增刊)、都兴宙《王梵志诗用韵考》(《兰州大学学报》1986.1)、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吐鲁番研究论集》,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则是通过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用韵和用字(假借)情况来考察当时的语音实际。至于与敦煌音韵资料相关的研究论著, 则数量更为庞大, 其中仅专著就有《切韵音系》(李荣, 1952)、《切韵研究》(邵荣芬, 1982)、《汉语中古音新探》(古德夫, 1993)、《切韵综合研究》(黄典诚, 1994)、《〈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黄笑山, 1994)等多部, 单篇论文的数量自然更多, 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二、词汇训诂 对敦煌遗书的词汇训诂学研究, 也是首先从文献整理研究开始的。敦煌遗书发现不久, 王国维就注意到其中专收当时口语词汇的《字宝》一书, 并写了《唐写本字宝残卷跋》一文(《静安先生遗书》, 1919)。1924年, 罗福苕辑《沙州文录补》, 收录了英藏斯 6204号《字宝序》残卷。1925年, 刘复辑《敦煌掇琐》, 收录法藏伯 2717号《字宝》一卷和分类辑录当时日常用语并加以注释的《俗务要名林》(伯 2609号)一种, 但录文都有不少错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写本没有再受到关注。1955年, 姜亮夫出版《瀛涯敦煌韵辑》, 内中有伯 2717号《字宝》一种的录文, 并有跋语, 以为其书“可以考隋唐之语言, 明文字之变迁”。后来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别录》, 又据原卷重加校核, 并参以伯 2058、3906、斯 6204等卷, 写为定本。1964年, 台湾方师铎发表《明刻行书本〈碎金〉与敦煌写本〈字宝碎金〉残卷之关系》一文(《东海学报》6卷1期), 认为《明刻碎金》系由唐人《字宝碎金》演进而成。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关于《字宝》的研究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先后发表了砂冈

和子（日本）《敦煌出土〈字宝碎金〉の语彙と字体》（《中国语学》233辑，1985）、刘燕文《从敦煌本〈字宝〉的注音看晚唐五代西北方音》（《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张金泉《论敦煌本〈字宝〉》（《敦煌研究》1993.2）等文。1988年，周祖谟发表《敦煌唐本字书叙录》一文（《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也对包括《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在内的敦煌语言文字学著作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台湾的朱凤玉女士，从九十年代初以来围绕《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论文，其中部分成果已结集为《敦煌写本碎金研究》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1997）。朱书分研究篇和校笺篇，并附有各写卷照片，堪称是《字宝》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于《俗务要名林》一书的研究，除上面已提及者外，朱凤玉有《敦煌写本〈俗务要名林〉研究》（《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研究最为深入。此外，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亦收载《字宝》和《俗务要名林》，并有详尽的校记，可与朱氏的论著比勘共观。

敦煌词汇训诂学研究方面的最大成就当然是文献语词的考释。如众所知，敦煌俗文学作品和契约文书中有大量含义不易把握的俗语词，给阅读和理解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也对敦煌文献校录整理的质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59年，蒋礼鸿考释变文语词的著作《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从纵的和横的两个方面考索变文词义，探源溯流，考释精审，征引宏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推崇，被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的指路明灯”。该书后来一版再版，字数也由初版时的六万增至第六次印本的近四十四万，被学术界传为佳话。在蒋先生的影响下，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加入到敦煌语词考释的队伍中来，其中以郭在贻、项楚的成绩最为突出。郭在贻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郭在贻敦煌学论集》（江西人民1994），以及他和他的弟子张涌泉、黄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岳麓书社1990）。项楚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1991）、《王梵志诗校注》（上海

古籍 1991)、《敦煌歌辞总编匡补》(巴蜀书社 2000)。郭在贻和项楚的词语考释往往结合文献校勘,综合运用归纳、比较、推理的方法,旁证博引,论断类皆精审可靠。在这方面作出较大成绩的中青年学者还有江蓝生、袁宾、蒋冀骋、黄征、张涌泉、董志翘、方一新等人,其主要著作有江蓝生的《近代汉语探源》(商务 2000)、蒋冀骋的《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 1993)、黄征、张涌泉的《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 1997),以及蒋礼鸿主编,黄征、张涌泉、方一新、颜洽茂、俞忠鑫五位博士具体编撰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5)。此外,吕叔湘、徐震堃、徐复、周一良、吴小如、陈治文、刘坚、孙其芳、蒋绍愚、俞忠鑫、施谢捷等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列。

另外,五十年代以来报刊上还发表了数量颇为庞大的敦煌文献(尤其是俗文学作品)校勘方面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写卷多俗字,字迹多滂漫,有许多不同于后世刻本的书写特点,多俗语词和佛教术语),敦煌文献的校勘有着一些特殊的困难,不少这方面的整理成果存在着较多的质量问题,于是一些校勘商榷文章便应运而生了。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文章有蒋礼鸿的《敦煌词校议》(《杭州大学学报》,1959.3,中国语文专号)、徐震堃《敦煌变文集校记补正》及《再补》(《华东师大学报》1958.1~2)、项楚《〈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1,《敦煌研究》1985.2)、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整理校勘中的几个问题》(《古汉语研究》1988年创刊号)等。

三、文字 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字书主要有《字样》残卷、《正名要录》、《时要字样》,以及童蒙识字读物《千字文》、《开蒙要训》等。周祖谟《敦煌唐本字书叙录》(《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朱凤玉《敦煌写本字样书研究之一》(《华冈文科学报》17期,1989)、张金泉《敦煌古字书考略》(《辞书研究》1993.3)、《敦煌遗书和字样学》(《文史》41辑)、《关于时要字样等八种敦煌写卷的

考辨》(《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1997)),以及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1996)都对这些字书有过介绍。下面择要略作评述。

①《字样》残卷。本卷见于斯388号,卷首残缺,无书名和作者名,其后为郎知本的《正名要录》。周祖谟认为本书“是根据颜师古的《字样》进一步有所考定补充的。主要是辨别形近义异和别体俗书,指明何者为正字,何者可以通用,一以《说文》、《字林》为定”;其书写的时代“当在唐高宗或武则天之时”。至于其是否为杜延业的《群书新定字样》,周氏认为尚难确定。而朱凤玉、张涌泉则皆认为应即杜书的残卷。

②《正名要录》。本卷接抄于上揭《字样》残卷之后,字迹相同,当系同一人所抄。书名下题“霍王友兼徐州司马郎知本撰”。郎知本史书无传。《隋书·郎茂传》说“有子知年”,刘燕文认为“郎知本属知字辈,当是郎知年的同辈,是隋末、唐初时人”(《敦煌唐写本字书〈正名要录〉浅介》,《文献》1985.3)。朱凤玉据《旧唐书·郎余令传》载郎知年曾任霍王李元轨友的记载,推定郎知本当系郎知年之误。张涌泉则认为原卷“本”字字形分明,而正史所载屡经传抄翻刻,而谓“其名疑当从写卷作郎知本为是”。周祖谟指出《正名要录》“是一本分别古今字形的正俗和辨别音同字异的书”,包括比较隶定字与通行楷体笔画的异同、刊定正体与俗讹、辨正楷体与别体、定字形、定古今异体字、辨音同义异字六部分。张涌泉指出《正名要录》“是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书中所提出的‘随时消息用’的原则,说明了作者能够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汉字,能够随时变通,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多后世流行的俗字已在该书中被载录,如怜、床、粮、断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一些后人不甚了然的俗字在该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日本学者大友信一、西原一幸的《唐代字样两种の研究と索引》(樱枫社1986)、台湾蔡忠霖的《敦煌字样书〈正名要录〉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指导教授郑阿财,1994年6月发表,未见正式出版)是研究斯388号字样书的两部专著,蔡书后出转精,所论更为全面系统。蔡书分研究篇与笺证

篇，研究篇凡六章，目录如下：第一章绪论，简述字样学著作产生的背景及本书的写作意图；第二章《正名要录》概述；第三章《正名要录》之体例；第四章《正名要录》与其它唐代字样书；第五章《正名要录》之传承与开创；第六章《正名要录》之特色及价值。笺证篇以《正名要录》中之难解字为主要对象，所考尚称允洽。郑阿财《敦煌写本与中国中古文字学——〈正名要录〉考探》（《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纪念高明先生八秩晋六冥诞》，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所 1994）、李景远《对敦煌写卷 S388 的考察》（《中国语文论集》第十一集，韩国釜山庆南中国语文学会 1996）也对该书进行了评介。

③《时要字样》。凡存三个写卷，即斯 6208、斯 5731、斯 6117 号。斯 6208 号有两部分，前一部分为分类抄录事物名称的字书残页，后一部分即本书残片，首行题“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下卷第口(三)”，所存皆去声字。斯 5731 号残卷首为去声字，与斯 6208 号相衔接，周祖谟以为系同一抄卷断裂为二，极是。斯 5731 号凡存三十九行，后二十五行为入声字，入声字前题“时要字样卷下第四”。周祖谟据此推断全书当为两卷，上卷为平声字和上声字，平声为卷上第一，上声为卷上第二；下卷则为去声字和入声字，去声为卷下第三，入声为卷下第四；所谓“时要字样”和“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其时要并行正俗释”实系同书异名。这是一种分别同音异义字的字书。如：“逸放佚乐溢满，三。”这是指“逸”是放逸之“逸”，“佚”是佚乐之“佚”，“溢”是满溢之“溢”。被注字与注字连读，便是被注字的意义。最后的“三”是表示该组同音字的字数是三个。日本学者西原一幸有《敦煌出土〈新商略古今字样撮取其时要并引正俗释〉残卷について》（金城学院大学论集国文学编第 28 号，1985），可以参看。

④《千字文》。敦煌文献中有《千字文》的抄本很多。周丕显《敦煌本〈千字文〉考》（《敦煌文献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搜稽考讨。周氏指

出，敦煌文献中包括真书、篆书、草书、注本、汉藏对照本和习字本《千字文》达三十四卷之多（周氏的统计仅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载，事实上，敦煌文献中的《千字文》写本至少有五十余件之多）。周氏在逐卷介绍敦煌本《千字文》及历代著录情况的基础上，对《千字文》的作者和千字来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千字文》（包括敦煌抄本）系后梁员外散骑侍郎周兴嗣奉梁武帝之命集王羲之所书千字，按韵编成。

如前所说，敦煌写卷中有大量异体俗字，给敦煌文献的整理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而也推动了俗字研究的开展。1949年，唐兰在《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中强调近代文字的研究。他说：“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1959年，蒋礼鸿发表《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一文（《杭州大学学报》1959年《中国语文专号》），该文以敦煌写本俗字为基本材料，对俗字与正字的关系、俗字研究的现状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俗字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等都作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这是汉语俗字研究方面的一篇具有导夫先路意义的重要论文。可惜限于当时的整个学术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积极开展起来。1978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偕弟子王三庆、曾荣汾、郑阿财等十余人编辑出版了《敦煌俗字谱》（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78年版）。潘氏在序文中指出：“敦煌写本，字体骹乱，正俗纠纷，斯谱之作，所以为敦煌写本导夫先路也。……凡欲研究某一时代之作品，必须通晓某一时代之文字；欲通晓某一时代之文字，必须通晓某一时代书写文字之惯例。吾人苟不研究敦煌之俗字，即难望通晓敦煌之作品。此俗字谱之作所以不容或缓也。”该谱取材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和日本神田喜一郎编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包括敦煌写卷178种。该书收录了大量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字异体，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写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取材过于狭窄，难以代表敦煌文献俗字的全貌；加上缺乏简择，印刷不清，影响了实际使用效果。稍后金荣华为

此书编制了《敦煌俗字索引》(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80),查检较原书便捷。除《敦煌俗字谱》外,潘氏还发表了《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孔孟月刊》1980.7)、《用敦煌俗写文字校释文心雕龙刊本中残存俗字考》(《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之研究》(《敦煌学》17辑)等一系列论文,就敦煌俗字研究的意义、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八十年代后期,郭在贻和他的学生张涌泉合作,以敦煌俗字研究为中心,先后发表了《俗字研究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与研究》5辑,中华1990)、《俗字研究与俗文学作品的校读》(《近代汉语研究》,商务1992)等论文。后来张涌泉又发表了《敦煌写卷俗字的类型及其考辨方法》(《九州学刊》4卷4期,1992)、《敦煌文书类化字研究》(《敦煌研究》1995.3)、《试论汉语俗字研究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6.2)、《大型字典编纂中与俗字相关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4)、《敦煌文献校读释例》(《文史》41辑)等二十多篇论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张涌泉又先后推出《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敦煌俗字研究导论》(台湾新文丰1996)、《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1996)三部专著。《敦煌俗字研究》的下编《敦煌俗字汇考》把见于敦煌辞书中的俗字和敦煌写本中可以用作偏旁的俗体汇为一编,“每个俗字下酌加考证,其中包括书证、例证、按语等项。按语中既有字形的辨析,又有其它传世古籍的旁证,上串下联,力图勾勒出每个俗字异体的来龙去脉”,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文献的整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论著之外,近一个时期以来还发表了一些与敦煌俗字研究有关的论文,如施安昌的《敦煌写经断代发凡——兼谈递变字群规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4)、《论汉字演变的分期——兼谈敦煌古韵书的书写时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2)、《敦煌写经递变字群及其命名》(《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4),孙启治的《唐写本俗别字变化类型举例》(《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杜爱英的《敦煌遗书中俗体字的诸种类型》（《敦煌研究》1992.3），郑阿财的《敦煌文献与唐代字样学》（第六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1995），郝茂的《论敦煌写本中的俗字》（《新疆师大学报》1996.1，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分册1996.8）等。另外，蒋冀骋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1993）、《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1997）也用一定的篇幅讨论过敦煌俗字问题，可以参看。

四、语法 汉语学界通常把古汉语分成上古、中古、近代三大块，敦煌俗文学作品上承中古，下开近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近些年来，汉语学界以敦煌变文为中心，对近代汉语的语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赵金铭的《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1979.1）、梅祖麟的《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举”字》（《中国语文》1983.1）、曹广顺的《敦煌变文的双音节副词》（《语言学论丛》第12辑，商务1984）、江蓝生的《概数词“来”的历史考察》（《中国语文》1984.2）、刘子瑜的《敦煌变文中的选择疑问句式》（《古汉语研究》1994.4）等。特别是吴福祥的专著《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以敦煌变文为主要资料，对晚唐五代的语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汉学界的好评。此外，吕叔湘等《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问题研究》（山东教育1991）、刘坚、江蓝生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取材举例也多涉及敦煌俗文学作品，宜当参看。

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以外，敦煌文献中还有若干藏文、西夏文、吐火罗文等民族语文资料，这方面的研究也很有成绩，限于学识，这里只能藏拙了。